

中国当代文学讲座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编

中国当代文学 讲 座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编
1982·2

目 录

根据《决议》的精神总结文艺运动的历史

- 经验 朱寨 (1)
谈十七年的文艺运动 李曙光 (27)
现实主义——新时期文学的主潮 何西来 (50)

漫谈建国三十一年来的短篇小说

- 的创作 蒋守谦 (106)
略谈建国三十一年的中篇小说创作 张韧 (165)
农村题材小说的再评价问题 张钟 (199)
谈谈赵树理研究 黄修己 (214)
并非一条狭窄的路
——谈军事题材的小说创作 徐怀中 (247)

气质·调子与散文风格

- 兼析杨朔和秦牧散文的风格 余树森 (271)

回顾一个不算遥远的背景

- 新中国诗歌的成就与检讨 谢冕 (287)

人间要好诗

- 对当前新诗一些问题的看法 邵燕祥 (324)

- 谈《茶馆》 夏淳 (359)

- 中国电影文学一瞥 罗艺军 (386)

- 后记 (423)

根据《决议》的精神总结文 艺运动的历史经验

朱寨

我讲的题目是个一般化的题目，就是根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来总结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这个问题也是向我自己提出的问题。因为我们当代文学的历史是两部分工作：一部分是管现状，一部分是属于历史的。我是参加这个工作的，也企图、也正在准备将这三十年来的文艺运动作些总结。这部分工作迟迟地分头看材料、断断续续已两年了，但是，一直没有正式进行。对于这三十年来整个的历史，特别是重大的运动，我们自己没有材料，没有能力作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因此，对这段文艺上的问题也就感到遇到了问题。

这次，《决议》公布后，我学习还很差，没有认真地系统地逐字逐句地学。学到一点，根据《决议》精神，有些启发，思考了一些问题，在这里跟大家讲一讲，与在座的同行们交换意见。

下面讲几点：

一、要明确一个基本观点。

总结三十年来文艺历史经验，首先应明确一个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观点，也就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应该温习一下马克思、恩格斯这些经典作家关于这一问题的主要的、核心的论证。

恩格斯讲：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件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他在另一个地方又指出：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们首先必须衣、食、住、行，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生产者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念、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作得相反。当然另外还应看到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也是恩格斯所说的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是消极的结果。我想这些就可以概括他们的意见了。当前我们来共同温习一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有好处。特别是我们面对着一些青年人或青年学生，他们就连这种表面上的、文字上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了解得也比较少。比如说“信仰危机”，实际上对这些青年来说，并没有真正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因为他生长在一个很动荡的时代，十年“文化大革命”，不要说建立这种观念，连最基本的、起码的学习都没有接触过，所以，我们作为

老师，有必要对青年人进行这种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常知的教育。

文艺虽然不象政治、法律那样与经济基础联系得那么直接、密切。政治，用列宁的话来说，是经济基础的集中表现。法律，是对一定生产关系下的财产、人权等强制的保护。文艺不象政治、法律那样立竿见影地反映经济基础的变化，直接为经济基础服务，它有自己相对的、独立的发展历史和作用于基础的份量。我们常说的庸俗社会学或者机械唯物论，就是否认或者忽视文艺这个上层建筑是高出其他上层建筑的上层建筑。有它不同于其他建筑的特点，但是，必须看到，它究竟是上层建筑，究竟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产物，究竟最终地受到经济基础的决定和制约。文艺与政治、法律不同，但并不是相反，而是受政治、法律以至道德观念的影响和制约。这就是说我们总结三十二年来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不能离开我们国家三十二年的社会发展历史。应该而且必须放在三十二年来整个历史发展的基本背景上来回顾，来总结。这个基本背景，就是《决议》概括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历史的伟大转折以来的五年。

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么个基本观点。

二、要注意一个基本事实。

要注意一个基本事实，就是要注意建国以来三十二年我们的文艺运动的历史有这样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文艺运动与政治运动密切联系。

建国以后，一些直接影响和左右了我们国家进程的重大政治运动，可以说都是从文艺上来发难。我们不妨按时

间的顺序来提提这些大事。例如：

一九五一年的《武训传》批判，虽然是批评电影《武训传》这部片子，但是这个问题的提出不是单纯从文艺的角度提出的，而是从文艺问题提出了更加广泛、重大的问题。用毛主席的话讲，“这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说明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难道不是事实吗？”因此，批《武训传》所引来的、所展开的是一次全国范围的思想改造运动。我们年纪大的同志可以回顾一下，建国初期有一次较大的思想改造运动，就从批《武训传》来的。关于思想改造，当时毛主席是这样讲的：“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功。”这是《武训传》所引到的那次思想运动。

一九五三年九月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就是在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为了贯彻总路线的精神召开的。周总理在大会上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政治报告》。茅盾同志在同时召开的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用的是这样的题目：《新的现实与新的任务》，会议提出的新任务是由于新现实的需要。一九五三年十月展开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这个问题，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的研究的通信，是《武训传》批判运动的继续和深入。就是继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这种批判深入到哲学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矛头对着的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胡适。当时，第一篇透露了这个批判的意图的，那就是一九五四年十月三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的

钱俊国同志的文章。毛主席的信是十月十六日，钱的文章是十月二十三日，正是相隔一周。钱那篇文章题目是《应当重视对〈红楼梦〉研究的错误观点的批判》，对于李希凡、兰翎两个同志合写的批判文章，认为是对三十年来对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胡适派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反击的第一枪。接着先是与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的联席会，后来是中国科学院政工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举行的联席会又批判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胡适的资产阶级观点，扩展到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全面批判。这个批判运动也是遍及全国。如果说《武训传》批判主要是对着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改良主义，那末，这次的批判主要是对着资产阶级的唯心论。这是五四年。

一九五五年有一次全国范围的肃反运动，就是由对胡风的批判引起的、开始的。建国以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公开批评是早在一九五三年初开始的，那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林默涵同志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一篇是何其芳同志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这两篇文章都发表在一九五三年一月末二月初《文艺报》的二号和三号上。这两篇文章也是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的一个内部小型会议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讨论、发言的基础上讲的。同志们都了解，周总理和胡风在文艺思想上的分歧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开始了。最早从胡风办的《希望》杂志发表的文章就曾攻击当时延安整风运动提出的反对主观主义。用现在的话来说：“唱反调”，以及其他问题。解放以后，周总理建议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在内部开个小型会议来帮助帮助，胡风同志也谈

谈，大家也谈谈，希望他能够接受一些批评。内部这会上没有解决，他是拒绝了批评。所以发表公开批评的文章即林默涵、何其芳同志的文章。内部的批评早已经批评了。后来，一九五五年，也就是在批判《红楼梦》研究的同时，在《文艺报》召开的会议上，胡风作了个发言，阐述了意见。当时主要是批判胡风，所以接着就在《文艺报》上公布了胡风在会上的发言，同时把他的《意见书》公布。后来，“作协主席团就决定对他的思想错误展开彻底的、全面的批判。那就是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公布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一批材料，对胡风作为政治上的批判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一九五五年公布的第一批材料就是舒芜的信件。到二十四日公布了第二批，六月十日公布了第三批。当第二批材料公布以后就明确了它的敌我性质。二十五日文艺界还组织了第一场联席会议，作出了对待敌人的决定，就定下了“反革命集团”这个性质。接着，当年的七月三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社论，从此开始了全国范围的“肃反”运动。

以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虽然不是由文艺运动发难而引起的，而文艺却都是运动中的重要内容。文艺界反右派有全国影响，人民写诗的新文学运动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提出来的，应该说对当时的浮夸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和鼓噪的作用。“二革”，就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也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部队文艺座谈会是林彪和江青两个阴谋集团的头子互相勾结篡党窃国的预谋。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刷评揭开了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序幕。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可以说是一九七六年的“四五”群众运动的同一概念。“四五”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群众基础。天安门诗歌运动就是这次群众运动的战旗和武器。

一九七八年十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们党的历史的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我国的文艺运动也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从这个粗略的举例中，可以看出建国以来历次的文艺运动都与重大的政治运动密切联系着。因此，总结三十年来文艺的历史不能离开三十年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历史。评价某一重大文艺运动的工作不能离开对当时政治历史的评价。

《决议》对建国三十年的历史的进程，主要是对政治经济方面的发展变化、功过得失、经验教训作了全面的概括、基本的总结。这不仅有助于我们评价、总结三十年来的文艺运动，而且是总结评价三十年的文艺运动的前提。当然，历史的决议不能代替文艺运动的总结，但文艺运动的总结必须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上才能找到它的最后的根源，说明真正的原因。关于这个《决议》，邓小平同志说是可以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一九四五年也有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已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邓小平同志讲，这个《决议》是可以经受历史考验的。对这个《决议》我经过初步的学习，感到这么几点：

首先，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于面对哪怕是严峻的甚至是痛苦的历史事实。譬如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包括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个人所犯的错误没有

隐瞒历史的真相，同时也没有感情用事，贯穿着共产党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关于这一点，国内外是一致承认和称赞的。对以往那段历史的论述和评价，那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们都是经历过的，可以经得起历史事实的检验对照。

第二点，是《决议》广阔的历史视野，就是把三十年与二十八年联系起来，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站在更高的水平上来看待三十年，以便更加全面、准确。这就包括着我们要总结三十年的文艺工作，同时不能不联系着建国以前甚至“五四”以来所有的一切，好多问题是历史的继续。

第三点，总结经验教训对于今后有根本指导意义。所谓经得起历史检验，要经得起已经过去的事实在检验，包含经得起未来的事实在发展的检验。我想，我们总结三十年文艺运动的历史也应该这样，它为我们提供了榜样。

三、关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问题

这是我们总结三十年文艺运动的历史回避不开的问题。因为这三十年来每次运动的归宿，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它都是强调要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方向和他的指示精神。几乎每次主要的运动都是毛主席老人家亲自提出和发动的。这就需要加以区别，哪些是毛主席文艺思想，哪些是毛主席的个人失误。《决议》就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同志个人晚年的错误作了区分，这点是需要借鉴的。

更重要的是树立了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决议》是这样讲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着我们的行动；又说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仍然是我

们必须经常学习的。这些著作中包含着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于我们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对待毛泽东文艺思想应该采取同样的态度，还应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判断文艺理论的是非的标准。

确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地位，这就有一个清除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误解的问题，我想在这里谈谈个人的看法。

毛泽东文艺思想主要体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但不只是体现在这个讲话里。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没有自己的文艺科学体系，只有不成系统的片面观点。是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确实没有象黑格尔美学那样的教科书似的美学书籍，但是，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对于文艺没有新的历史见解、没有体系。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发展的规律，特别是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它就从根本上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一个根本观点。马、恩、列、斯直接论述文艺的著作，书信、言论，都是文艺上的一些原则问题，高度科学地概括了文艺的基本特征，比如马恩关于现实主义、关于典型的问题，列宁关于艺术的人民性、党性的原理，斯大林关于作品的写真实和对于作品的评价的基本倾向等问题的论述，历史证明，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应该说，《讲话》在马克思文艺著述里边是内容最丰富的、最集中的。如果我们仔细阅

读，就能够发现它容纳了马、恩、列、斯文艺上的观点，接触到我国革命文艺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问题和经验，根据我国新的历史特点，提出了新的文艺方针，系统地解答了文艺上的问题。毛泽东文艺思想建国以后又有重大的发展，特别是为繁荣文艺发展科学制定了唯一正确的方针，就是“双百”方针。今天我们有结合我们历史的经验教训来重新学习的必要，对一些本来没有认真学过的、又受到怀疑论的影响的人还有宣传的任务。

建国以来对《讲话》的曲解，我认为主要是来自“左”的方面，就是片面地、简单化地解释《讲话》。在这里，应该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林彪、“四人帮”把《讲话》歪曲为“整人的”、“判罪的”、“让人望而生畏的魔仗”。我们都还记得吧，《纪要》中打着《讲话》的旗帜而否定一切，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曾说：“《讲话》是对着周扬一条文艺黑线的”。我们可以回顾文化大革命，他们在文艺界掀起每一次黑浪，都要摇晃他们高举的所谓的“旗帜”。这在已经缺乏历史经验和基本没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青年中所造成的信仰危机，也包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危机，罪魁祸首是林彪、“四人帮”。当前也有一些来自右的片面的观点。这种观点并不能纠正“左”的片面的错误，而且还会给“左”的论述者提供片面错误观点的资本。别林斯基说得好，他说：“不能认为一个片面比另一个片面更好”。这就是，对于回顾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整个面貌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前不久报纸上公布了新疆一位基层人员听了《决议》关于对毛主席的评价以后的反应，我听了觉得也很生动、也很深刻、也很恰当。这等于把毛主席他老人家从天上请回到人间，不是贬低，是恢复他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的形象，由敬佩而变成亲切。我想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也应该是这样。

关于来自“左”的方面的片面的简单化的表现，我认为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把《讲话》的那些思想观点看成先验的。

《讲话》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那是正确的、毫无疑问的。但说它是空前的先天的预见，甚至看不到以至否认对马、恩、列、斯理论观点的继承，这是错误的。对《讲话》的产生，脱离开当时具体的历史背景看。对于《讲话》背景的介绍过于空泛，多半是根据《讲话》中谈到的关于当前形势的起点以及什么打一场世界大战等。就是没有说到它的直接的真实的背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降低了《讲话》的意义。所以极力地以国际国内的重大历史背景来解释，是非常虚无缥缈、象乘祥云瑞气从天边飞来的鸟，把这个《讲话》的背景说得虚无缥缈，这是不对的。

第二点，对《讲话》的主要精神有歪曲。《讲话》的背景不能离开延安思想整风的背景。我们理解《讲话》必须同与它同时期或者相距不远发表的其他重要文章联系起来，比如《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等。因而它的直接的背景就是延安整风。整风是有阶级性的，但它并不是具体地针对着个人的错误，而是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就是对于王明路线的清算，也是贯穿了“治病救人”、弄清是非、团结同志这个精神的。我想，这个精神从四五年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可以看出，从后来“七大”王明仍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也能说明这点。至于对其他广泛的干部，这次整风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开展的一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

运动。那时我们在延安不知道什么，只在少数高级干部中才总结，象西北军开高干会议总结当时陕北历史，给刘志丹同志平反，清算流毒，当时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我们学员中只有象周扬等不多的一些人才知道。对于广大干部，就是学习文件，对照思想，写思想自传进行教育。毛主席选集的这些文章当时是作为绝密文件，是根本看不到的。所以这个整风运动对于广大干部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帮助，进行正面的教育。可后来我们一强调路线斗争，对于什么是“路线”这个概念我们当时还是弄不大清楚的。所以整个延安整风是有教育意义的。至于后来康生搞的抢救“失足者”的“抢救”运动，才改变了整风的方向。所以，座谈会和《讲话》的总的精神是对文艺队伍的教育。就是后来批判到的观点和人，也是作为革命队伍内部的批评教育。批评的是错误的观点，而不是人。批评到的人并未作为批判的对象。毛主席当时《讲话》里所讲到的，我们当时也不知道，也不许传下去。后来何其芳同志写的《毛泽东思想的颂歌》把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具体情况都谈到了，我当时并不了解这话提的是谁，这话是谁说的，这人怎么样，大家也并不去注意。这些批评对受帮助的人有普遍意义。比如后来受到批评的我们常提到的象丁玲、艾青、肖军、何洛，他们在当时也都参加了对王实味的斗争。如艾青当时写了《现实不容歪曲》，见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解放日报》，当时中央马列学院连续召开了批判王实味的座谈会，丁玲同志在会上作了批判发言，后来也写出了文章《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的反省》也是在这前后写的。《讲话》以后，他们创作上都有新的表现，比如丁玲同志，当时陕北边区正在召开劳模大会，她写了钱宝

林等几个劳动英雄的特写受到了主席的称赞，她自己说，乔木同志打电话给她，肯定她，鼓励她。又比如说欧阳山，大家都知道，我们讨论问题不要从概念出发而要从实际出发。当时欧阳山同志在座谈会上讲了一些马列主义的基本文艺理论。他后来创作了《高乾大》。艾青写了长诗《吴满有》。因为吴满有是当时有名的劳动模范，《兄妹开荒》里“向劳动英雄们看齐”就是指的要向吴满有学习。后来国民党进攻边区时，他被逮住了，叛变了，在广播电台作了一些敌人所需要的反共宣传，反共讲话。他的长诗也跟着灭亡了。但作为一个历史来说，艾青尝试着用群众化的诗歌形式来描写劳动人民的生活，而且艾青同志本人当时就是边区的劳模。他们后来经过整风以后，在文艺界都担任着重要的职务，包括肖军，也是解放以后到东北在哈尔滨让他自己办一个刊物，搞出版社，那是很放手的让他来开展工作的。后来对他批判当然不说了。所以我们一提原来的整风，好象还不是随便的样子，好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我想在这里引一个材料，可以说明当时的企图。就是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范文澜同志的一篇文章，这是在中央研究院六月十一日座谈会上的发言，因为我临时找这文章没有找到，研究院主编的现代文学资料中有，不是从头引的。我只是节选一部分念念。他这篇文章提到胡乔木同志曾给他写信，向他转达了毛主席当时对王实味的意见（胡乔木当时是毛主席的秘书，也是中央研究院负责人之一）信中是这样说的，胡乔木同志写了两次信向范文澜同志（当时马列主义学院的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信上说《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批评的是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的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巧。毛主席说希望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

立场。那篇文章充满了对领导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越是这样的批评越能团结一部分同志，对党越是危险的，越有加以抑制的必要。上面是乔木同志这封信转述了这些。到后来，查到了他加入了托派组织，和托派有联系，这才采取了组织的措施，开除了他的会籍。不过就是后来嘛，他还出面接待过边区的来访记者。我想，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可以说明党对王实味尚且如此，何况其他同志呢。

由于后来的再批判改变了问题的性质，因此就影响了对《讲话》的理解和印象。使人对《讲话》产生了这种印象，好象《讲话》主要就是对着敌对阶级和敌对思想，是对这种思想的打击和批判。其实，《讲话》的主要精神还是对着革命队伍内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是对革命队伍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的一种批评教育。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如果我们冷静的看，我们从《讲话》中可以看出，是循循善诱，是教育，绝对不是杀气腾腾的无情打击。它是对大量的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一种批评教育。我想，从《讲话》本身可以看出，从四五年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可以作个旁证。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是对“左”倾路线错误的分析的结论，指出它的根源。它的根源是什么呢？如同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思想一样，

“左”倾路线所反映的是中国小资产阶级民主分子的思想。我们党内历次发生的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政治上的“左”右倾，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等等现象，无论就其是否形成了路线、掌握了领导，显然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为了当时人民的利益，采取教育的方法，将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分析和克服，促